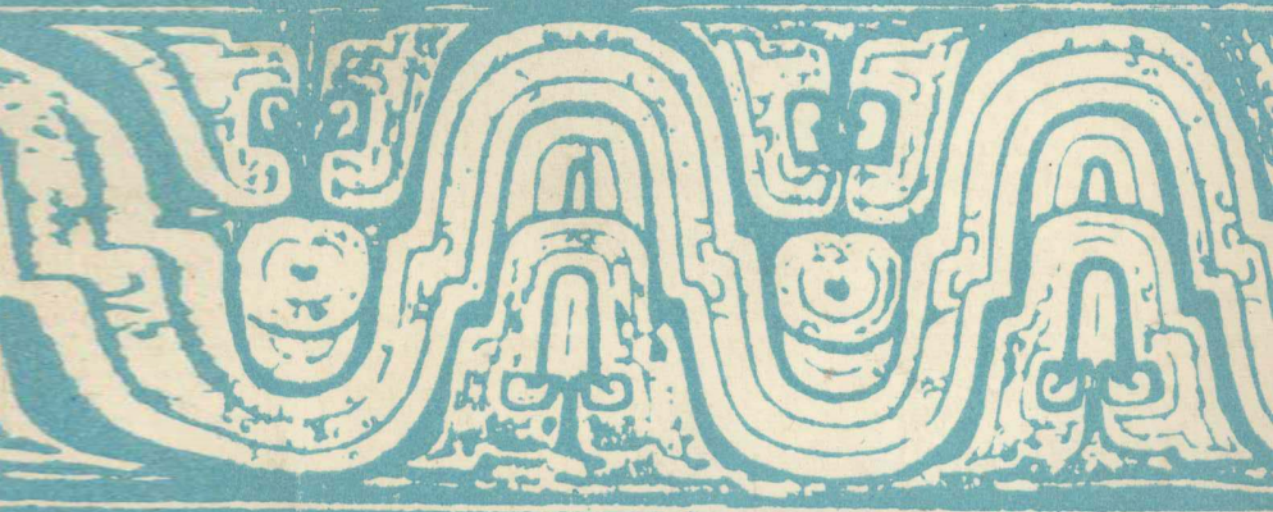


西周史略

〔日〕白川静 著

袁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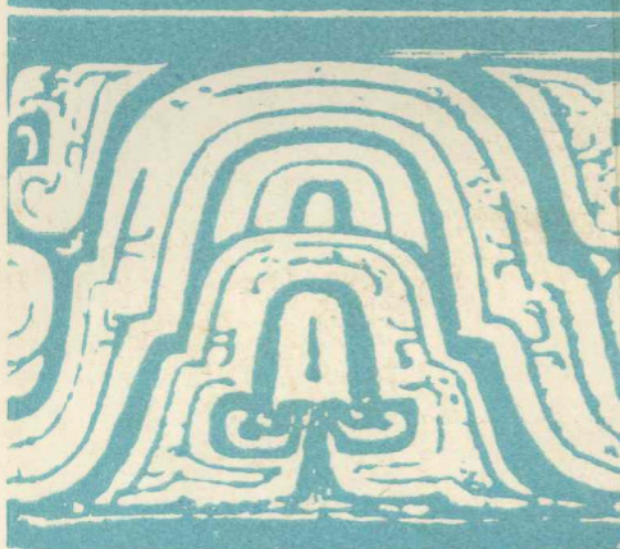
三秦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慧福

封面设计：毋培华

ISBN7—80546—194—5 / K·73

定价：2.50元



〔日〕白川静 著

袁林 译

徐喜辰 校

周史略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西周史略

[日]白川静 著

袁 林 译

徐喜辰 校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119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西安第 2 次印刷

ISBN7-80546-194-5/K·73

定价:2.50 元

目 录

校者的话	(1)
第一章 殷周之际	(6)
一、西周史与金文资料	(6)
作为西周史之《周本纪》 原始资料与其可靠程度 依据金文资料重新构筑西周史	
二、文、武创业与王权	(9)
文、武受命与天室礼仪 克殷之前东方的离叛者 殷周革命的性质 武乙之僂辱天神与诛杀季历 西伯戡黎 王权与神职人员	
三、东与西	(18)
克殷传说 成周庶殷与陕西庶殷 周初大封建 殷旧王畿与管、蔡之叛 东西之地域特殊性	
第二章 周初之经营	(27)
一、北方的殷周彝器	(27)
禄父之叛与录氏 山东殷周彝器 匱侯北征及其器群 石家庄、凌源的殷周彝器 匱侯与北燕 远征河北的意义	
二、东南诸夷	(36)
东南夷与奴隶制 王姜与周、召二公 殷系氏族军队之动员 安州六器与湖南殷文化 关于宜侯矢殷 江淮地区文化	
三、封建与奴隶制	(43)
封建规模 商政周索 赏赐人鬲的仪式	

社会结构之多样性

四、三都之营建…………… (47)

新邑的营建与《周书》 新邑之礼仪 三都
之制 成周与周、召二公

第三章 莽京辟雍…………… (53)

一、康、昭时期之南征…………… (53)

休王康王说 康、昭时期之南征 宗周钟与
猷侯 新出伯钺诸器 东南诸夷的动向

二、汲冢之书…………… (59)

《穆天子传》之传说 《竹书纪年》与远游
传说的史实性 《班铎》之毛班与井利 徐偃
王传说与《班铎》 穆王时期的马政

三、辟雍礼仪…………… (67)

莽京辟雍与镐京辟雍 藉田之礼 大凤纹器
之盛行与《诗》篇 《周书·吕刑》 西周
前期的社会与文化

第四章 政治秩序之建立…………… (75)

一、廷礼册命与官制…………… (75)

前期的廷礼 廷礼册命之定型 右者与执政
官职系统 三事之职 鬲士与鬲寇 小子
师氏虎臣

二、二世三王时期…………… (83)

失传的时期 密康公与师毛父 懿王时期的
师氏宫廷礼 懿、孝时期与今本《纪年》
师职与武德 军事力量的基础 封建的臣属关系

三、金文与《诗》…………… (91)

金文的押韵 《周颂》与器铭之对扬文 正
雅《诗》篇的编纂 后期金文与乐官

第五章 夷王时期与淮夷的动向	(100)
一、烹杀齐侯.....	(100)
堂下之礼 《师旋殷》与烹杀齐侯 纪侯之 谮毁 王室经济的矛盾	
二、淮域诸夷.....	(105)
淮夷之隶属 夷臣与夷允 王族经营地 对异族人员的管理	
三、噩侯之叛乱.....	(110)
对南淮夷的视察 夷王时期之南征 《禹鼎》与讨伐噩侯 鬲陶之臣 宣王时期 的叛乱	
四、成周之通正.....	(118)
成周与东方之经营 成周礼仪 成周庶殷及 对其之通正 通正诸器 西周后期的成周	
第六章 贵族社会之兴衰与西周的灭亡	(125)
一、土地经济之发展.....	(125)
土地人鬲之赏赐 社会的阶层分化 《晋 鼎》的习惯法 大土地所有及其经营形态 各氏族之消长	
二、夷、厉时期之衰落.....	(132)
豪族之富强 战士阶层的形成 《小雅· 十月之交》与《雨无正》 变雅世界 对创 业的回顾	
三、共和时期前后与西周的灭亡.....	(139)
厉王奔彘 共和时期 王政中兴的意义 豪族的僭上与西周之灭亡	

校者的话

我国的西周历史，文献资料很贫乏，但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往往记载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这种第一手的直接史料，远比文献资料为重要。解放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发展，文物考古工作的加强，新资料越来越多，利用青铜器铭文进一步研究西周历史，已经具有很好的条件，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今天，我们如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如能运用金文资料和过去研究的有益成果，是可以写出一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西周史用来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金文是属于铭刻学的范围，它和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商周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的许慎是被认为曾经见过金文资料的人。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了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的著作有《考古图》（吕大临，1092），《宣和博古图》（王黼，1123）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点和藏家。到了清代，出土器物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超过宋代，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1804）、《揅古录金文》（清吴式芬，1895）、《邃斋集古录》（清吴大澂，1896）、《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清方濬益，1899）、《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5），和《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7）等一批著作。只《西清古鉴》（清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了古器千余种之多。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结合考古发掘工作，金文资料的积累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

来出土的殷周青铜器，日新月异，而且大都有出土记录可考。例如西周窖穴的发掘有：1960年扶风县的齐家村，1961年长安县的张家坡，1974年扶风县的强家村，1975年岐山县的董家村，1976年扶风县的庄白，1978年岐山县的凤雏村，均在陕西省内。在这个时期内，又出土了许多诸侯所造的铜器，例如1954年江苏省丹徒县出土的《宜侯矢斚》，北京市和辽宁省喀左出土的燕侯诸器，1955年安徽省寿县出土的蔡侯诸器，1974—78年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中山王诸器，1977年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诸器，1978年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罍》。其已发表的铜器铭文已经超过了一千余件以上，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不下几千种。仅就专著来说，目录学方面的有《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雉，1981），《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1983）；字典方面的有《金文编》三订本（容庚，1953、1985），《古文字类编》（高明，1980），《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1985）等；通论方面的有《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1958），《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1982）等；文字考释方面的有《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1952），《读金器刻词》（马叙伦，1962），《殷周文字释丛》（朱芳圃，1962）等；资料方面的书籍更多，举其要者就有《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1962），《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博物馆，1963），《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1964），《长安张家坡西周青铜器群》（考古所，1965），《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陕西考古所，1979），《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1981），等等。最近出版的《商周金文集录》（徐中舒，1984）一书收集了解放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973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殷周金文集成》正在陆续刊出，是一部集金文之大成

的著作。在台湾省又有《故宫铜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58）、《金文总集》（严一萍）和《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等刊出。在香港则有《金文零释》（周法高，1951）、《金文诂林》（周法高，1974—75）等出版。此外，在日本出版的有《日本蒐储支那古铜菁华》（梅原末治，1959—62），《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松丸道雄，1977），《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林已奈夫，1967）；在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拜纳、张光裕，1978）；在美国出版的有《弗利亚博物馆藏青铜器》（1967），等等。

在已经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常常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关西周断代的，如武王时的《利簋》，成王时的《小臣单觶》，康王时的《大盂鼎》，昭王时的《过伯殷》，穆王时的《班殷》，恭王时的《史墙盘》，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禹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等。关于西周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有：《利簋》记载武王伐商，《小臣单觶》记载周公东征平叛，《何尊》记载成王营建成周洛邑，《董鼎》记载燕国与宗周的关系，《宜侯矢殷》记载周初的分封制度，《史墙盘》记载微氏家族世谱和文王至穆王时的功业，《曶盨》记载厉王时的邦人即国人暴动，《召鼎》记载奴隶的买卖，《卫鼎》、《卫盂》、《格伯殷》及《散氏盘》均记载划分田界、田土交换，《大克鼎》记载西周的世官世禄，《猷匜》记载有关法律和盟誓制度，《小盂鼎》记载征伐鬼方，《过伯殷》记载昭王伐楚，《班殷》记载征伐东国，《禹鼎》记载征伐南方的鄂，《不殿殷》、《兮甲盘》和《虢季子白盘》记载征伐玁狁，等等。此外，还有记载祭典仪礼的《大丰殷》、《驹形盥尊》，记载赏赐的《大盂鼎》、《永盂》和《毛公鼎》等等。所有这许多铜器铭文对于研究西周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文中曾经写道：“夫彝器之可贵在足以征史。苟时代不明，国别不明，虽有亦无可征”，颇有见地。正因为这样，1955—1956年间，陈梦家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西周铜器断代》三十余万言，批评和修正了郭老之说。可惜此稿未能完成，西周后半尚未讨论。日本国的白川静袭用郭、陈二家之法，出版了《金文通释》（1962—73年间出版白鹤美术志1—40辑，1978—79年间出版48—50辑，补释近年出土之器），共讨论了千件左右的周代铜器铭文。1974—79年间白川氏又奋力写成了《金文学史》（41—42辑）、《西周史略》（46—47辑）以及《考古学、金文学、历法的研究方法》、《西周断代与年历谱》和《列国器编年》（43—45辑）等。所有这些，1964—82年间又同《金文通释》一起由京都的朋友书店以六卷八册的形式刊出。此外，他还写了一本通俗的书《金文的世界》（1971）出版（已由韩东育同志翻译完毕，正在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刊物——《先秦史研究动态》中连续刊出中）。兰州大学历史系袁林同志翻译出版的《西周史略》一书，是白川氏在唐兰发表《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一文的后一年出版的。他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朝着新方向即利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史开步走的开拓性的著作，我们非常欣赏他的这种尝试和做法，这也是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同道者的主要理由。《西周史略》一书中提出的金文断代、对历法的计算和一些词语的解释等虽然不无可商之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以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精神去阅读它，肯定是有启发和裨益的。

白川静先生，1910年生于日本国福井县，1943年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法文学部，现为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他专攻中国文学，除《金文通释》、《金文的世界》外，还著有《甲骨文集·金文集》（二玄社）、《说文新义》（五典书院）、《汉字》（岩波

书店)、《诗经》(中央公论社)、《孔子传》(中央公论社),《中国的神话》(中央公论社)、《甲骨文的世界》(平凡社)、《汉字的世界》1、2(平凡社)、《中国古代文学》1、2(中央公论社)、《汉字百话》(中央公论社)、《中国古代文化》(讲谈社)、《中国古代民俗》(讲谈社)和《初期万叶论》(中央公论社),等等。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是一位言必有征、钩稽采获、深入浅出、具见苦心的学者,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

三秦出版社同意印行此书,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在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美好前景激励下,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做出一些贡献。

为了忠于原文,我们采取了直译的原则,只是作了一些文字润色。由于我们的日文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徐 喜 辰

1986年12月于东北师大历史系

第一章 殷周之际

一、西周史与金文资料

西周史，至今仍是古代史中近乎空白的领域。最早之通史性质的记述，当然始于《史记·周本纪》，但它不过是拾缀《诗》、《书》及其他古传说而成，仅只附记了周王系谱及一些神话，很不充分。至于历代周王在位年数，除了最后宣、幽两代外，共和以前均未记载。对此空白状态，无论在此后的修史中，还是在近代学者的古史研究里，也几乎没有予以补充。即使有些补充的尝试，也只是追补史料价值不太高的汲冢出土《竹书纪年》等等的记载而已。《史记》所用资料，大体上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其记叙之原始资料，几乎涉及它所可能追寻的范围。仅仅根据文献资料，使西周史的研究伊始就具有局限性。而且，这些原始资料的可靠性，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应当作为分析的对象，这是因为，随着作为当时资料的金文的出土，已经具备了相当数量可以分析其同时性的依据。

关于西周金文，在《金文通释》中已列举了标准器198件，其关联器也很多，此外，还可继续添加近年新出的彝器。今天，依据金文资料重新构筑西周历史，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可能。以前依据文献资料而撰成的西周史，非常缺乏历史可靠性，与此相反，由于西周金文具有当时资料的绝对可靠性，只要注意这些资料的处理，以此为史料来编写西周史也就成为可能。关于资料的处理方法，除对铭文作考释外，还应涉及断代编年问题，我在《金文通释》中的断代编年研究，大致就是这方面基础工作的尝

试。本书的打算，就是依据这种新史料重新构筑西周历史，并叙述其梗概。

所谓西周史的重新构筑，是要代替依据文献而编纂的周王朝史，前者应该通过对后者的批判来进行。因此，有必要概略地分析一下作为其唯一依据的《周本纪》之构成。谈到《周本纪》与原始资料的关系，其始祖传说之姜嫄感而生弃的神话是来自《诗·大雅·生民》，姜嫄为帝喾元妃是来自《大戴礼记·帝系》，后稷出仕于舜而为农师是取于《书·尧典》，后稷子不窋出奔戎狄之间是出自《国语·周语》，公刘于戎狄之地修后稷之业为《诗·大雅·公刘》所述。此后数代世系是基于《世本》等谱系之书，古公亶父经营豳地是依据《诗·大雅·豳》篇。太伯、虞仲的传说见于《左传》、《论语》，季历之事来自《诗·大雅·皇矣》，其子文王之记述则取于《书·无逸》。至于下面插入的伯夷、叔齐传说，大概是来源于《孟子》等书。文王拘囚于羑里的传说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淮南子·道应训》和《尚书大传》等，虞、芮之讼为《诗·大雅·豳》篇所述，文王讨伐诸恶则依据《诗·皇矣》、《文王有声》及《书·西伯戡黎》，也与《尚书大传》一致。所谓文王纪元说是根据《书》之解说。武王克殷，可认为依据汉初本《泰誓》，又引述了《牧誓》、《逸周书·克殷解》中的文字。以下叙述二王三恪及齐、鲁封建，多是采用《书序》文字。武王营造洛邑是取于《逸周书·度邑解》，纵牛放马来自《吕览·慎大》，其后关于箕子的事迹是依据《书·洪范》，至于武王有疾，则是概括了《书·金縢》的记载。周公行政七年系连缀《书序》而成，以下至昭、穆之记述皆系依据《周书》诸篇而成。

祭公谋父谏止穆王征伐犬戎的传说见于《国语·周语》，接着引用了《书·吕刑》，穆王时期的叙述是根据这两篇文章撰成的。下面的共、懿、孝、夷四王几乎只列举了世系，就连《礼记

·郊特牲》关于夷王即位时执堂下之礼的记载，以及《公羊传·庄公四年》所见的烹杀齐侯事件，也未收入。

厉王三十七年，由于宠幸好利的荣夷公而引起民众起义，出奔于彘，民众打算杀掉留下的太子，为召公所救，这个故事见于《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虽取三十七年说，但于各世家则均取十六年说。十六年说之误，可依据金文之断代编年得以纠正。关于共和，异说很多。对于宣王中兴，《诗》中虽有记述，且与金文一致，但《周本纪》均未触及，仅据《国语·周语》叙述了宣王不修千亩之礼并败绩于姜氏^①之戎的传说。幽王时期之衰乱与西周之灭亡，均见于《国语》，从《郑语》、《晋语》等采取了一些离奇的故事，又据《吕氏春秋·疑似》等篇添加了褒姒的传说。

以上是《周本纪》的结构及其原始资料，若从今天的文献批判的方法看来，这些几乎都不过是依据解经文字和巫祝传说一类的二手资料。例如，《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段记述大约依据《书序》而来，而成康时期的金文却表现出，这是西周戡定作战规模巨大、次数频繁的时期。又如说：“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段叙述与以《诗·小雅·鹿鸣》为刺诗的《十二诸侯年表》相同，似均依据于三家诗说，但是，共、懿时期是廷礼册命形式金文的完成时期，可以视为周代政治秩序的确立时期。仅就《周本纪》这样的文献资料来看，认为西周时期仍处于传说时代、否定其历史实在性的看法虽然也可以存在，但是，若依据遗留下来的丰富的金文资料，重新构筑与《周本纪》完全不同的西周史也是可能的，而且，必须通过这样的重新构筑使古代史的各种问题具体化。在古代史中，怎样从发展史的角度规定西周史，这应是研究的出

① “氏”原文为“氐”。——译者注

发点。

二、文、武创业与王权

关于周王朝为文、武王所创立，在金文中也有谈到周之建国时并称文、武的例证。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曰：“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玟王，嗣玟乍邦”，将周之创立归于文、武二王。在西周中期的《宗周钟》铭中，说及南方疆土时云：“王肇遘省文武董疆土”。到西周后期《虢伯殷》铭的“王若曰，虢伯，朕丕显祖玟玟”，《询殷》铭的“王若曰，丕显文武受命”，《师询殷》铭的“王若曰，师询，丕显文武，孚受天命，奕则殷民”，《毛公鼎》铭的“王若曰，父厯，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雍受大命”，等等，都作了同样的表述。以“王若曰”的形式传诵周王话语来回顾文、武之创业，大概是在周室面临困难局势和危机感增强的时候。《大盂鼎》系接近所谓成、康之治的康王末年的彝器，但仍有必要对殷民叙说周之受命，宣扬其王权的正统性。周初军事行动的基本结束，虽然可以说是在康王末年《小盂鼎》所记的征伐鬼方成功之后，但地方性的戡定作战仍在继续之中。

《虢伯殷》、《询殷》大约是夷王时期的彝器，这个时候南夷极为猖獗，在周王朝内部也引起了政治混乱，《师询殷》、《毛公鼎》大约是共和时期周室旷绝之际的彝器，都是内外多事、危机感很强的时期。此时有关回顾文、武之创业、谋求复古精神之高涨的语句，在《诗·大雅·荡》等篇中也可见到。《荡》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第七章），其中采取了祖灵训告的形式，这与金文中以“王若曰”称述文、武受命相同。这样的受命说教，与其说是对内，不如说是对敌对者而发。因此，在《大盂鼎》铭中，继前述引文之后，

将殷的亡国归于其丧德，以周之受命为其有德的结果。《师询殷》铭中也说：“丕显文武，孚受天命，奕则殷民。”《诗·大雅·荡》篇大约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殷周革命之后已经过了二百余年，这时谈论殷周之事，当然没有其它现实意义，强调文、武受命只是为了所谓奕则殷民，用以向从属诸异族宣扬当时的政治意图而已。孟和询，当系周之异姓，大概本是东方系氏族，因而在其彝器铭文中追述殷周之事，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受命思想，即一般称为天的思想，认为它是作为使殷周革命合理化的观念并出于政策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种看法不一定妥当。即使现实中有这样的政策需要，那也只有可使之观念化的条件历史地存在着的时候，才能得以成为现实观念。即，在受命思想的基础中，应当有周人对天的固有信仰。殷人祭祀帝，禘祀天，并以王室为其嫡系。禘、嫡字源、语源相同，因此，殷王也称为帝乙、帝辛。而周人的天与王室没有世系关系，不具有人格神的属性。天能选择地上的统治者，是授夺王权的最高存在。大概他们的王位继承方法也是采取这样的北方民族的形态，由此产生了太伯、虞仲一类的传说。殷周革命，根据周人的观念，当然是依据天意的王位继承法的扩大。

他们信仰天、修治天室礼仪，这从《大丰殷》及新出《利尊》铭文中可以知晓。《利尊》大约为成王初年之器，记载着成王决定迁都成周的事。其文首曰：

佳王初酈宅𠄎成周。复𠄎珙丰福，自天。才四月丙戌，王喜宗小子𠄎京室。曰，昔才𠄎，考公氏克速玟王。隸玟王受兹𠄎大令。佳珙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辭民。

这里的天，指天室所在之地，似为执行祭天礼仪的神圣场所。铭